

第二卷

第五篇 论立法和行政权

第一章 引言

对于已经确认的各项原则的回顾。——其余问题的安排。——本卷主题。——政权形式——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本书以前各篇，既然已经充分做好准备，因而现在可以相当明确而顺利地进一步研究实际的细节，换句话说，可以探究一下如何应用那些最有助于人类逐渐进步的一般正义法则。

我们已经看到，关于社会交往原则和实践的研究，乃是锻炼人类思想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个人的善恶，都取决于这些原则构想得是否正确及其实施方式；政治制度必须同永恒的正义法则紧密相联才能对人类有益；而这些原本具有普遍性的法则，是可以同样适用于全人类的。

政治制度的各种问题，大概可以最明确地分为如下四项：关于一般行政的规定；关于增进个人智力和道德的规定；关于实施刑事审判的规定；以及关于支配所有权的规定。我们在每一项下所要做的，是按照我们对于已经确认的崇高而普遍的原则坚信的程度来消除弊端，而不是提出更多更具体的规章，是使之简化而不是使之更为繁杂。我们尤其不能忘记，政权，抽象地来看看，是一种罪恶，是对于人类自由判断和个人良心的侵犯；虽然我们也许不得不承认这在目前是一种必要的罪恶，但是我们是重理性和爱人类的，因而应该尽可能地少承认它，并且应该仔细地加以考察，看看我们所不得不承认的那一小部分今后是不是可能由于人类思想的逐渐觉悟而再减少。

首先，我们准备研究一下关于一般行政的各项规定；一般行政这个词的涵义包括通常称作立法和行政权中一切必要的规定。立法这个名词，在人类社会中已经证明并不适用。人们只能颁布法律和解释法律；凡是抽象的和永恒的正义没有使之成为法律的东西，人间就不会有一种权力，能够使之成为法律。虽然如此，人们也可能认为有必要授权一个权力机关去颁布一些一般性的原则，以维护社会公道，并且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据以作出决定。关于这种必要的现实性及其范围应该留待以后研究。行政权包括截然不同的两部分：一种是同特殊紧急情况有关的一般审议。这种审议权从实际可行上来考虑，可以由一个个人行使，也可以由一群人行使。这种审议的项目包括决定和战、规定赋税以及选择召开审议大会的适当时间。另一种是特定的职权，

参见第一篇。

同上

参见第二篇第二章。

参见第一篇第六、七章，第三篇第七章。

参见第二篇。

参见第三篇第五章。

参见第七篇第八章。

我把规定赋税看作作行政机关的一项事务，是因为它不象制定法律或者颁布法律那样公布某些一般性的原则，它只是应付某种特殊紧急情况的临时性法令。

例如实施财政细则或具体的监督工作，这种职权只能由一个人或少数人来行使。

我们谈到这几种权限以及考虑把它们委托给什么人最相宜的时候，除去采用一般把政权形式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的分类方法以外，恐怕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们可以研究每一种政体所根据的原则的得失，首先是从绝对的观点，假定这些政体各自代表整个政府来进行研究；其次，是从局限的观点，也就是假定这些政体只构成政权组织的一个部门。至于把办理行政细节委托给下级人员，在这几种政体中，一般都同样是司空见惯的。

另外一点也有必要事先说明。我所列举的三种政体的各自得失，都将从消极方面来加以考虑。人类的共同义务都是他们个人的胡作非为和愚蠢的后果。假定人类没有缺点，或者假定人类在天性上是能够仅仅通过说服就能很快地和彻底地改正错误，那么社会就会终止其作用。因此，这三种政权形式和它们的组成，哪一种最不限制我们发挥和运用个人的智力，哪一种就最好。正是考虑到这个真理，我才主张使用政治制度而不用政权这个名称。在没有必要采取强力迫使个人就范并且没有顽梗的成员需要制裁的时候，前一个名称似乎就足以说明个人一定会隶属于其下的那种相对形式，不论它属于哪一类。

第二章 论教育，王子的教育

君主政体的性质。——在艰苦中成长。——豪富容易养成软弱的性格——容易妨碍

我们取得经验——以王子为例。——人们对王子的态度。——对王子进行教导是无效的。

首先，研究一下君主政体；并且假定王统是继承的。这样就更便于我们研究那个刚一出生就被置于万人之上的贵人。

对于国王的抽象观念，具有极端重要和异乎寻常的性质；虽然由于碰巧受了教育，我们从童年时代起就熟悉了它，但大部分读者也许仍能记得曾经对它感到惊异和大惑不解的时期。既然我们必须有某种政权，并且个人为了整体的利益，必须让出一部分使他成为自己言行主宰的那种神圣而重要的权利，所以下一步就必须研究究竟采用什么权宜手段来代替行使这种固有的权利。这些手段之一就是君主政体。每个人所关心的是：他的个性应该尽量少受侵犯；更不容许因为在位者荒唐任性、阴险奸诈，或者忿怒偏私和感情冲动而遭到侵犯；从社会每个成员的特有权利中所严行征集来的这种权力，使用时必须有节制和审慎从事。所以，把这种宝贵的东西竟而交给一个人去掌握，实在是一种十分大胆的冒险。如果我们考虑人类的体力和脑力，就会看出他们更适合于管理个人私事和偶然帮助别人，而并不适合于接受正式委托去管理千百万人的事务和维护千百万人的幸福。如果我们想到人类体质和精神上的平等，那么，把一个人安置在跟他的同类距离如此悬殊的地位上，那就未免粗暴地违犯了这一平等的原则。现在，我们不妨看一看这样的人通常是怎样受教育的，或者他们可望受到什么样的教育，他们对于担任这一高贵职位具有什么样的准备。

通常都认为：“一切突出的美德都必然在艰苦中养成。法国的亨利四世和英国的伊丽莎白，在登上王位以前，都经历过重重的磨难。野蛮时代的朦胧历史曾经记载了艾尔弗雷德的优美德行，他曾在流浪和亡命的生活中饱经忧患。即使弗雷德里克和亚历山大那种瑕瑜互见的，总的看来是有才无德的品质，也并不是有没有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和迫害就形成的”。

不过这种设想似乎有些过甚其辞。认为不经过不公平的待遇就不能养成美德，并不比另一种流行的见解更为合理，这后一种见解认为没有虚假和欺骗，人类就不能获得幸福。这两种错误的来源，全都是不相信真理有无限力量。有这些主张的人如果更深入地考虑过人类思想的本质，就一定会看到人类的一切自觉行动都是出于智力的判断，那些最为明智有益的行动，不可避免地都是从衷心相信真理中产生的。

虽然这种夸张逆境有益的见解是错误的，但它和我们的许多其他错误一样，是同重要的真理有联系的。即使认为艰苦并不必要，但也必须承认顺境则是有害的。这里所指的并不是那种真正的，哲学意义上的顺境只包括身心健康和能够靠着适度而有节的劳动为自己获得生活必需品、美德和智慧；而是指通常所理解的那种顺境，也就是从人类任意规定的制度中得到一种本领，靠着它可以使我们四体不勤、无所用心；尤其指的是王公贵族的那种顺境，

艾尔弗雷德（849—901），英国西萨克逊有名的国王。——译者

弗雷德里克（1712—1786），普鲁士国王。——译者

亚历山大（1777—1825），俄国沙皇。——译者

参见本篇第十五章。

即一种豪富，它使我们脱离开与同胞之间的一切平等交往，使我们成为高贵的囚犯，的确可以以虚荣和显赫自豪，却不能获得社交的真正利益和认识真理。即使真理是真正有力量的，不必靠艰苦来刺激我们去对它重视，可是奢侈和富有对于歪曲真理却当真是有致命的影响的。即使真理并不需要凭借外力的帮助，我们仍然应该对于具有抵制真理作用的倾向的因素和环境保持警惕。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道德最本质的要素之一就是坚忍。许多希腊哲学家，尤其是狄欧根尼，曾经企图向人类表明，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如何极其有限，我们的真正幸福和顺利又如何并不仰仗别人无常的喜怒。在证明这一主旨的数不清的有记载的事件中，只需提出一件就足以使我们体会到它的一般精神。狄欧根尼有一个叫作米娜斯的奴隶。米娜斯某次竟然私奔了。这位哲学家说：“好啊！米娜斯没有狄欧根尼能够生活；狄欧根尼没有米娜斯难道就不能生活吗？”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再重要不过的教训。一个人不懂得自己不应该受人摆布，不认为自己不应该受命运变化的播弄，他就不可能有任何持之以恒的美德。一个理应受到同胞信任的人，一定是坚定的，因为他思想中充满自己所追求的目的的崇高性；同时也一定是乐观的，因为他相信一切意外变化都不能伤害他。即使有人认为对道德的这种看法是提得太高，但大家也必须承认那种经不起风浪、受不得艰苦、全靠虚伪做作才能活下去的人是不配我们信任的。一个人一旦处在人类真正朴素的状态中，竟会悲观失望，无以自存，恐怕没有再比这个更应引起我们轻视的了。坚忍是产生于独立感的一种精神素质。如果一个人在设想的环境变化中竟然不敢相信自己的想象力，那么，他必然软弱无能、优柔寡断、因循苟安。爱好声色犬马胜过美德的人也许值得我们怜悯，但是只有疯子才肯把自己所珍惜的东西委托给这样的人来处理。

再者，能够把真理传达给人的思想的唯一方法，是通过感官的道路。一个人被关在一间密室里，大概是永远不会聪明的。如果我们打算获得知识，就必须打开眼界观察宇宙。在我们还不熟悉名词的涵义和周围事物的性质时，我们就不会理解与之有关的命题。在我们还不熟悉周围事物的性质时，我们也不能拿它们同我们所树立的原则相比较。也不会懂得应用这些原则的方式。在艰苦中成长以外，还有获得智慧和能力的其他道路，但是任何道路都必须通过经验这个媒介。换句话说，经验为我们的智力提供原材料；我们究竟必须承认，一个人经验虽然有限，但常常会比一个经过多少风波的人更有能力；或者不如这样承认：一个人要在几平方英里范围之内积累经验，可能比一个周游世界却不去积累经验的人所获更多。

为了正确地估计经验的价值，我们应该回想一下人类思想所获得的许多进步，以及一个有觉悟的欧洲人和一个独居的野人有多大的区别。这些进步无论如何多种多样，但是任何个人能够取得的方式只有两种，不是间接地从书本上或交谈中获得，就是直接地从我们对人和事物的观察中获得。我们以第一种方法所获得的进步是无限的，但是单这样还不行。我们在没有看到书本里所讲的那些事物的时候，我们是无法理解有关的书本的。

了解人类思想的人，一定是亲自考察过的；洞悉人类思想的人，一定是在千变万化的情况下进行过考察的。他一定曾经在没有外界事物抑制人的激

情或诱使他做作而不流露真情的情况下对他思想的原貌进行过观察。他一定曾经在人们毫无戒备的时候，在一时激怒使他们口不择言的时候，在希望使他们兴致勃勃的时候，在希望使他们折磨苦痛的时候，在他们把灵魂深处的秘密向同伴和朋友倾吐的时候观察过他们。最后，他本人就一定就是个当事人，曾经引起过自己的激情，体会过期待时的不安和成功时的喜悦，否则，他对于所看到的事物不会有很多认识和了解，就象一般人对于水星上的玻璃人或者住在太阳上的火怪的事情所认识和了解的那样。——真正的哲学家，真正的政治家，关心并有益于人类的人所受的教育就是这样。

那么王子所受的教育是怎样的呢？第一个特点是极端的温和。天上来风也不容许吹到他的身上。穿衣脱帽都有随身仆从伺候。有什么需要并不用开口；有什么愿望，不用他费一点力气，都会得到充分的满足。他的健康对于大众太重要了，绝对不能叫他的身心受到一点劳累。绝对不能让他听到责难。凡事都得首先记住他是个王子，那就是说，凤子龙孙不同凡人。

因为他是王位继承人，所以他周围的人从不会忘记把他的一颦一笑看得关系重大。为此，他们也从不在他的面前坦率而自然地表示关于他或者关于他们自己的意见。他们都在演戏。他们全都戴着假面具。在他们的思想中，自己运道和收入总是放在第一位，同时他们却又急于表现他们慷慨、无私和真诚。他的一切喜怒无常，他们都曲意奉承。他们看出他是一个堕落和卑贱的生物；他们用自己的欲望和能力来衡量他；他们推荐的赏心悦目的事物，这足以使他更深地坠入愚蠢和罪恶的深渊。

这种教育的结果怎么样呢？由于从来没有人稍稍违逆他的意愿，青年王子总是骄横跋扈的。对于被迫做奴才或者甘心做奴才的人已经司空见惯，所以他甚至不理解自由一词的意义。他的性情傲慢，不容直言极谏。他一无所知，却以天纵自诩，他还胆大妄为，并不是由于坚定勇敢，而是由于极端任性和虚骄。就象古代哲学家中的皮罗一样，如果他的侍从不在身旁而让他一个人留在室外，他也许会一遇到马车就被撞倒，一碰到悬崖就掉下去。他的凶暴跋扈和他的极端怯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一遇到反抗就会惊慌失措；凡遇到和感到困难都似乎无法克服。杯弓蛇影使他发抖；丝毫艰苦都能使他涕泗滂沱。因此有人说过，王子们迷信神鬼的程度一般都超过普通人。

最重要的是：他听不到素朴纯粹的真理。真理这个稀客也许从不会来，或者即使一旦做了不速之客偶然光临，也会受到冷遇，至使它没有勇气再来。他越是长期习惯于谎言谄媚，真理就越觉得刺耳。他越是长期习惯于谎言谄媚，改变爱好、离开亲佞就越觉得可怕。他绝不是对一切都盲目相信，就是在发现他最喜欢的人对他并不真实以后，断定一切都心术不正、阴险诡诈。由于这最后一种看法，他会变得对整个人类漠不关心，对他们的痛苦无动于衷，并且认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过是戴着更巧妙的面具的无赖。这就是注定要管理千百万人的事务和谋求千百万人的幸福的那种人所受到的教育。

在这样的画面中可以看到构成王子教育的那些最明显的特点，假定进行这种教育并没有使用过有干劲和有道德的人。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教育在不同程度上是有所不同的，但除去在少有的情况下这些特点，大部分都必然相同。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设想使他们受到象前面所描述的那种关心并有益于人类的人所受的教育。

要说明这种普遍失败的原因并不困难。最有才智的教师在这种环境中，也必然在无法克服的困难情形下进行工作。任何一种处境也不会象一个王子的处境那样不自然，那样不容易为有这种处境的人所理解，那样不可抗拒地推着他走向错误。这种处境所给他的最初的概念就具有镇静和麻醉的性质，使他认为自己不可思议地拥有某种比别人优越的天赋条件，凭借这种条件，他生来就是要发号施令，而别人则要俯首听命。如果你想告诉他并不是那样，你也只能得到一种不是衷心的和暂时的相信，因为事实胜于雄辩，而在这种情形下，事实在不断证明你的话是靠不住的。如果要不是象他所想的那样，那么，为什么每一个接近他的人，会都渴望侍奉他呢？他不能很快就发觉驱使那些人这样做的那种卑鄙自私的动机。甚至可以怀疑的是：一个从来没有用自己的真正需要去检验过别人的说法的人，会在任何情形下能够完全认识到那些人的后一般也还有那么一点可信之处。一个王子，远在他能够获得使他配受尊荣的任何真正优点之前，就已经发现他自己受到别人的趋奉和崇敬。你能用什么理由劝说他努力去追求一种看来完全是多余的东西呢？当所有的人却都使他相信他自己的才能值得赞颂，他的思想清如明镜的情况下，你怎么能够诱导他使他不满意于他已有的成就呢？一个发现自己的一切想法都已经被别人事先考虑到了的人，你怎么能劝说他去从事任何勤奋的努力，或者提出远大的目标作为自己的抱负呢？

但是，即使你在这方面能够成功，他努力的结果也可以想象会是有害的或者是无益的。他的智力是不正常的；一切道德的基础，即认为其他的人跟自己都是同等的人这种概念，早已被他根本忘记。我们没有理由期待他会做出任何慷慨而近人情的事。他已经这样的不幸，而他的处境还不断地把他推向罪恶，使他身上的任何正直和美德的幼苗在出土之前，就全部摧毁。如果他产生一点现实感，那也马上会为谄媚的毒氛所损伤。逸乐和荒淫用迫切的声音向他召唤，不容他有考虑的时间。由于他扮演的角色本来就是做作的，即使他愿意博得美名，那也只会凭借矫揉造作的假斯文，或者野蛮的压迫征服来得到，而不会通过平易近人、朴实无华的仁慈的道路。

关于教育王子通常所采取的方法和所收到的效果，可以从德·让立夫人最近一部著作中得到一些印象。她在这部书中叙述了她自己教育奥尔良公爵的子女的作法。她这样描绘他们在交她管教时的性情和习惯特点。她写道：“德·瓦卢瓦公爵（最年长的）常常是举止粗野，语言可鄙。他高兴用粗俗的名称去谈论一般平常的东西；这一切都带着桑科式的怪僻，说的時候故意纵声大笑。他终日唠唠叨叨，从不察觉听到这些废话的人会不十分满意；他还经常用最严肃的态度来撒谎，把它当做开玩笑。不论是他还是他的兄弟，除自己之外，对任何人都毫不关心；他们自私而贪婪，认为替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以为在任何方面都没有考虑别人幸福的义务。最轻微的责备对他们都是极大的打击，他们立刻就绷起脸或者用眼泪来发泄他们因此而感到的愤怒。他们娇嫩异常，怕风，怕冷，不能奔跑跳跃，甚至不能带劲地散步，也不能每次超过半小时。德·瓦卢瓦公爵极端怕狗，怕到这种程度，只要看见一条狗，就会吓得面如上色，大声尖叫起来。”“当奥尔良公爵的子女交我照管的时候，他们习惯于一到冬天就穿上贴身背心、两双长袜和戴上

德·让立夫人（1746—1830），法国女作家，写有关于教育的著作。——译者
桑科小说《唐·吉珂德》中的人物。——译者

手套，手笼等等。最大的已经八岁，可是没有一两个人搀扶就从不下楼；仆人们必须替他们做最卑贱的差事，只要他们有一点着凉或者任何微小的不适，就要连夜坐守。”

德·让立夫人是一位具有卓越才能的妇女，虽然本身不免有许多错误，但却纠正了这些青年王子的缺点。但是，很少的王子能有这样好的运气，得到象德·让立夫人这样具有独立和坚定精神的人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应该拿她的前任而不是拿她作为一般衡量的标准。即使不是那样，我们也已经看出，一位教师教育一个王子时都能做些什么事情。更不应该忘记在她照管下的儿童，还并不是似乎要继承王位的那类王子。

见德·希勒里·布律拉夫人（前德·让立伯爵夫人）所著《一个家庭女教师给她学生的训导》。

第三章 王子的私生活

影响王子的因素——不负责任——不受约束——习性放荡——无知——厌恶真理——

——厌恶正义。——王子的可怜处境。

教养是这样的；它所产生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在青少年时代思想受到的影响，一般到老不忘；我们现在所谈的也是就一般的情形而言。假如有这样的国王，象也有这样的普通人一样，在他们的成长中，特殊原因的力量超过了一般的原因，这种例外情形也是同君主政体的好坏不大相干的。造化之神并没有塑造王子智力的特殊模型；君主政体当然不是根据神权建立的；因此，不论我们在天赋才能这个问题上采取什么理论，普通的国王，最多也不过具有普通人类的智力。在已经谈过和将要谈到的问题上，我们不要专门想到天才，而应该考虑到一般常见的那样的人。

一个人的未来的性格，虽然大部分取决于所受的教育，但如果把这种探讨再深入一步，也许不是没有益处的。教育，在一种意义上，是青少年时代的事情；但是从更严格而准确的意义上来说，有智力的动物是活到老学到老的。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产生一种想法的根源，不是证实，就是否定我们思想中已有的观念。

在国王未成年时代对他们起作用的因素，在他们成年以后，仍然会继续对他们起作用。一切可能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人的事物，都极为小心地不让他们看到。一切办法都想到了，为的是使他们相信自己非同凡俗而且受着不同的生存法则的支配。“一个国王，虽然担负着种种神圣的义务，但是他是否加以履行却只对上帝负责。”这至少是君主专制政体的一条原理。这也就是说：他虽然比普通人多受着百倍的诱惑，但他却不象普通人那样通过感官的媒介经常接受外界有形事物给他们的思想所加的限制。他被教导去相信自己超乎一切约束普通人的限制之上并且只受对他特有的一种法则所支配，每一件事都归之于冥冥世界的意旨；这些意旨，不论从逻辑的观点来看，应该给他们以什么样的评价，都是人类现在所不能理解的，是置身于尘世中的人所不能强烈感受的，而它们在同感官刺激和有形事物的诱惑力相抗衡的时候，也是很少有胜利的可能的。

有一句为全世界公认的名言：“一切国王，本质上都是暴君。”并且，这句话在实验中，也是很少得不到证明的。立宪君主和专制君主，在许多方面虽然有所不同，但它们相同之处总是主要的。完全不受限制的君主，严格他讲也许是从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所有的国家对于专制政体都有某种限制，并且认为是对其独立自主的充分保证。所有的国王都享受到高度的豪华和安逸，都曾经为极端的谄媚和谎言所包围，并且个人都可以完全不负责任，以致损害了人类思想的自然和健全的面貌。他们既被安置在这样高的位置上，于是感觉自己和社会最高权威之间只差一步，他们不能不急切希望跨出这一步。他们在太多的场合下看到自己的命令受到了盲目的服从，他们在谄媚奉承的奴颜婢膝的环境里，受到过长期的熏染，因此，对于限制了他们的无限权力的强项敢言的人，就不可能不产生愤怒。但我们随即可以证明，“一切国王，本质上都是暴君”；也就等于说，一切国王，不可避免地必然都是人类公敌。

善行的主要源泉，是理想。一个只顾眼前享乐的人，将永久是欲念和私心的奴隶。他不会有任何原则来抑制自己的欲望或者促使他去从事公正爱人

的事业。善良无邪的道理，虽然辞意恳切，却是听了就忘。因此，我们看到：最有助于攀登道德高峰的无过于深思；最不利的无过于耽于逸乐。希望国王记住他在流亡或失意时期的美德那是非常可笑的。我们常常看到，他们就是失掉一个佞幸或者宠臣，也会很快地有以自慰。一个影子接着一个影子，在他们脑子里很快地逐一出现，没有一个能留下持久的印象。造成这种道德感缺乏的一个条件，就是长期的享乐所养成的柔弱和怯懦。他们的思想，在痛苦的想法面前，在唤醒他们努力的动机面前，在要求严肃对待的问题面前，必然畏缩不前。

设想一个异邦人，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不了解我们的生活习惯，没有一个朋友可以商量或给他帮助就参加到我们的纷杂繁忙的事务中来，难道还有比这更为不幸的局面吗？如果这样一个人还能得到什么东西的话，那保险是一群窃贼、骗子和敲诈的恶棍对他立即进行的包围，他们会用最不可靠的故事欺骗他，在每一件他所需要的或要拿来交易的物品上蒙混他。最后，当他离开这个国家时，将同他来的时候一样，孤立无援，对这个国家毫无了解。国王就是这样的一个异邦人；但是有一点不同，如果异邦人是个聪明而有洞察力的人，他可以逃过这群捣乱的人，找到一些值得他信任的人；但是，对于一个国王来说，在任何情形下这简直都是办不到的。他被安置在自己特有的一个圈子里。他为一种气氛所包围，他不可能看到事物的真象。接近他的人，所最关心的事，就是不让他了解真情实况，这些人结成了阴谋集团。一个人不能接见每一个来客，把自己的身体交给别人来监督，并且在不知不觉中被他所最应该了解的人和物隔离开，那么，这个人，不论他有什么尊称，事实上都是一个囚犯。

不论人世间的专制制度有什么样的理由，我们的更为有力量的天性，是不允许一个人管理千百万人的事务和照顾千百万人的幸福的。一个国王很快就会感到，有必要把自己的职务交给臣仆们来掌管。他养成一种依靠他们的眼睛来监视，利用他们的双手来办事的习惯。他感觉到必须盲目信任他们的忠诚。他象长期关在地牢里的人一样，各种器官已经衰退，经受不起真理光芒的照耀。他习惯于通过别人来了解人类的思想感情，所以他没有直接处理事务的能力，任何人要想忠告他远离他左右的宠臣，劝谏他把已经采纳的主张和理由，重加周密的审查，这等于叫他做一件无法忍受的痛苦的事情。他会马上拂袖而去，把这种责难转告他的佞幸；这样，他听从惯了的巧言令色的人，三言两语就能把这个新的揭露粉饰过去。国王会把满腹疑团、忧虑和猜测抛到九霄云外，依旧去追欢寻乐；或者赏心乐事不招自来，使他不能不接受，并使他把让他心里布满忧疑的那个故事立刻忘得一干二净。人们常常谈到勾心斗角和两面三刀，认为这类事情破坏了商业经营，影响了学者间的交往，并且在乡村的小事上制造了纠纷。但不管有没有它们不会出现的场所，宫廷无疑却总有对它们适宜的气候。把知识报告给国王的人，在那个圈子里，乃是大家共同厌恶的。宠臣总把他当作陷害的对象；而国王由于性情迟钝而无动千衷，不久就会把这个人交给要求对他进行报复的对手手里。费讷龙正因为考虑到这些情况，所以说：“国王乃是人类当中最不幸的和最容易陷入迷途的人。”

参见费讷龙：《泰雷马克奇遇记》第十三篇。关于同君主统治不可分的罪恶，这部著作的这一篇和下一篇作了我们在任何其他地方都看不到的最有力的和最生动的描绘。

但是，事实上，国王即使了解比较真实的情况，也没有多大用处。王权和罪恶，不可避免地是互相联系着的。道德品格越高，人也就越公正、越有操守、越真诚。但是生下来就堕落又被环境所毁坏了的国王们，是同这些品质无缘的。真诚，会让他们知道自己的错误和了解自己的怯懦；公正，不受表面的神圣尊严的影响，会根据真正功绩对人做出评价；操守，不会因任何诱惑而离开正直无私——所有这些品质在国王的心目中是可厌难忍的。他们躲避这些“不速之客”而去接近那些百依百顺的人，因为他们会阿谀国王们的错误，粉饰他们的行为，毫不迟疑地帮助他们沉湎于欲望之中。人类的天性中，很少有一种能够抵抗住长期谄媚和一贯顺从的坚强性。在我们中间成长起来的美德，是在平等的开阔的土地上、而不是在造作的伟大的气候中培养起来的。我们需要寒风的锻炼，正如需要热力的抚育一样。许多人一开始很有希望，但是当他们的事业一帆风顺，没有打击使他们清醒、没有灾难使他们反省的时候，终于会经不起长期安乐和舒适的考验。

君主政体，实际上是十分不近人情的，所以历代的人一直就十分怀疑它是同人类幸福不相容的制度。在重要问题上，真理的力量可以说是能够受到蒙蔽而不能被人遗忘的；而欺骗则从来也没有这样成功过，以至能够不在受骗者的内心里引起真理的强有力而不知疲倦的反抗的。一个千辛万苦勉强能够糊口的人，看见国王的豪华显赫不能不产生一种不平之感。他不免要在思想上怀疑，花费如此巨大代价雇用来服役的官员究竟有什么用处。他只要相当准确地考虑了这个问题，就会看到，而且还会十分吃惊地看到：一个国王并不比一个普通人高明，在能力、才干和道德的各个方面比他强的人有很多，而和他一样的人还要更多些。因此，他会感觉到，如果认为这样一个人最适宜和最有资格来管理国家大事，那是毫无根据和最不公平的。

这种想法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国王们自己也常常意识到在他们想象的幸福中所蕴藏着的危险。他们有时对人类思想进步感到惊慌不安；并且更常常认为他们的臣民的安乐和顺利，乃是恐怖和不安的源泉。他们正确地把自已的职务看作是一种公开的展览，其成功全靠观众的轻信，而凡是有良知和勇气的人一定会很快地使之受到轻蔑。因此，君主统治就有这样一句人所共知的座右铭：安乐是叛乱之母；为了使人民顺从，必须把他们保持在贫困的状态中。所以，专制统治者经常发出这样的牢骚：“安乐出顽民，富裕起争端。”所以，下面是经常向君主宣读的一项训诫：“如果你的臣民富裕，他们就会不再干活；他们就会变得桀骜不驯，一心反叛。只有贫弱，才能使他们屈服并防止他们反抗权威。”

国王的处境十分可怜，是一种世俗常有的看法。“他的全部行动都带着焦急不安。他不能象别人一样逍遥自在；如果他是诚恳而认真的，他就不能不考虑到：被他无意义地用在欢娱上的时间，也许对于挽救一个高尚而受压迫的人是十分宝贵的；在无数的事件当中，如果有了他的干预，不知会产生多少好处；多少天真无邪的心灵，会因为他的公正而获得安慰。国王的行為是应该受到人们最严厉的批评的，而他们的处境的性质，使他们无从听到这种批评。无数件他们并没有参预的事情是假借他们的名义干出来的，无数件事情都瞒着他们的耳目，使他们不能发现真相；国王是大家的替罪羊，所有

参见《珍妮·肖尔》（英国剧作家尼古拉斯·娄[1614—1718]所写的剧本。——译者）第三幕。

参见费讷龙：《泰雷马克奇遇记》第十三篇。

臣属的差错都写在他的帐上。”

没有比上面这种描绘更恰当、更公平和更近乎人情的了。为什么那些持反对君权主张的人却被当作国王的仇敌呢？这些人会把国王从“足以覆没一个舰队的过量的荣誉”中解放出来。他们会把他们提高到普通人的幸福而可羨的处境中去。事实上，没有一件事能够比把国王这种逆乎天意的职守强加在一个人身上更不公平和更惨苦了。这对于行使国王职权的人和对于受到国王职权支配的人是同样不公平的。凡是了解到自己的利益的国王，一定首先拥护这些主张，渴望听到这些主张，并且对那些使他们的同类认识到这个重要真理的人表示最热烈的敬重。

参见莎士比亚：《亨利八世》第三幕。

第四章 论善良的专制政体

从人类能力有限来反驳这种政权形式的所谓卓越性。——虐政的例子——企图实现善政的例子。——君主政体不适宜于统治大国。

关于这个问题，经常有人提出一种值得予以公平考虑的说法。拥护这种说法的人们承认：“君主专制，由于负责管理的人的缺点，大都容易产生罪恶；”但是他们认为：“在一个贤明的有德行的君主治理之下，这是一种最完善的和最理想的政权形式。”他们说：“它可以承受一切善良的天性的恩泽，在遭到腐蚀的情况下常常从最美好的变成最恶劣的东西。”我们如果重视前面所引证的，用来说明我们一般能够期待王子具有什么品德和性情的那些论点的话，这种说法对于整个问题自然就不会起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如果这种说法是真实的，它会使我们在思想上对这种幸福而完善的专制政体产生一种偏爱和留恋；如果我们能够证明这种说法是虚假的，那么，仅从这一点来说，就会使主张废除专制政体的论点更加全面彻底。

任何人不论有什么要增进别人幸福的心愿，为了加以实现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辨别力和能力。我之所以能增进少数人的幸福，是因为我能充分了解他们的情况。我之所以能在某些一般事情上增进许多人的幸福，是因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只要了解人类思想的本质就够了，而不必知道他们各自的具体处境。但是，要一个人来管理千百万人的事务，不是提供一般原则和明晰的推理，而是要提出特定的办法和满足当前需要的措施，这在一切企图要做的事情当中，实在是一种最不量力和最荒诞的了。

实际施政的最简单和最浅显的办法，就是使每一个人决定他自己的事情。在某种情况下，当人类的缺点、狭隘和错误使这个办法行不通或者不切实际时，另一个办法就是收集他同等的人的意见，这些人，由于同他们邻近，可以被认为对于情况有某种一般的了解，并且有时间和办法来细致地调查问题的是非曲直。我们不应该怀疑：审理民事和刑事案件中采用的权宜办法，也可以同样为那些平常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在规定赋税、从事商业以及办理跟他们共同利益有关的其他事务上所采用，只是根据需要解决的阿题的一般性的程度，更普遍地推行审议会，或者陪审团制度就可以了。

君主政体不是把每一件事都提交给有关的人或者他们的邻人，而是把它委托给同社会上普通成员距离最大的一个单独的个人。这种制度不是把应该做出判断的事情的原委，尽可能划分给许多小组，以便有时间和机会进行审查，而是把它们集中到一个中心，使调查和研究都成为不可能。一个专制君主，不论性情多么善良，也不能不在暗中摸索，从别人的报告中了解情况，依靠别人的帮助做出决定。君主政体似乎是同人类天性互相排斥的一种政权，那些把自己的君主描画得正直和有德行的人们，忘记了给他加上全知全能的品质，为了使更适合于他们替他准备的职位，这两种品质是同样需要的。

我们假定：在一个诚实而清正的君主下面供职的都是些假仁假义的贪官污吏。人民靠着他们的君主的善良心愿能得到什么呢？他满心希望给人民以最大的好处，但是，他对于他们的处境、性格和需要一无所知。他所得到的

参阅《托姆·琼斯》（英国作家亨利·菲尔丁（1707—1754）所写的小说。——译者）第十二卷第十二章。

报告经常同事实恰恰相反。人们告诉他，某人立了大功，应该受到奖励，实际上这个人唯一擅长的却是俯首帖耳的服从，以此来实现他的做官的目的。人们告诉他，某人是社会上的败类，实际上这个人遭到这种攻击只是由于他以自己坚贞的品德，抗拒并击败了恶政。国王想给他的人民谋求最大的福利，但是，当他要按照他们的利益采取措施的时候，他的臣下会阳奉阴违，做出一些完全相反的事情。要想消除大臣们对他的蒙蔽那就再危险不过了。谁要想担当起这种艰巨的工作，谁就会成为他们不断仇视的对象。国王不论怎样清正廉明，但总有为她视听所不及的时候，可是怨毒和报复却永远在窥伺着机会。如果他能把他的国家监狱的秘密揭开，他会发现用他的名义监禁起来的人，他从不知道犯了什么罪，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的名字，他们也许还是他所崇敬的人。这就是存留在人们记忆中的那些仁慈的专制君主们的故事；从这一切所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地方有专制政体，什么地方就会永远有专制带来的罪恶、反复无常和专横迫害。

“难道一个明智的国王不会为自己找到善良有道德的臣下吗？”他当然能够部分地做到，但是他不能改变事物的本质。一个以代表的身份去执行职务的人，永远不会以主要负责人的那种精神去完成任务。大臣或者是他所要实行的那个计划的起草人，这样，除去国王选择臣下时是否正直无私这一点以外，国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无关重要了；或者他所担当的是一个从属的角色，这样，他思想里就不可能充分反映他主人的聪明和才干。任何地方有专制政体，政权就不可能由一个人掌握，而必须完全通过各级权力机关的环节贯彻下去。要使专制政体执行仁政，不但需要君主具备人类的各种高贵品质，而且他的全部官吏都必须具有明察的才智和无暇的德行。如果他们不能达到这种要求，那就会象伊丽莎白的大臣一样，有时是一些虚有其表的浪荡公子，有时是一些非常善于处理技术性事务的人，但是在许多事情上却专门考虑个人的私利，趋炎附势，结党报复，阻碍新进。继承在哪里一中断，罪恶的洪流就会加诸它前面的一切。只要有一个卑鄙的或者奸滑的人，他就会成为无穷灾害的源泉。

另外有一种主张，同认为完美的专制政体是可以采取的主张同样经常被人提到：“共和政体是只能在小国里实行的政权形式，而君主政体则最适合于在巨大而繁荣的帝国中处理万机。”至少就君主政体来说，似乎立刻可以看出，这种主张正好同事实相反。衡量一下政权是否合格，最正确的标准是它了解情况的范围及其准确程度。在这方面，君主政体在一切情况下都显得异常无力；即使我们有时候承认它合格，那也一定是在一种狭窄和有限的范围内，只有在这种范围内，我们才能假定一个人能了解所有人的事情和利益而不至被人认为十分荒谬。

莱斯特的达德利伯爵。

财政大臣索尔兹伯里的塞西尔伯爵、海军大臣诺丁汉的霍华德伯爵等人。

潘恩：《致共和党人书》。

第五章 论宫廷和大臣

有计划地取得专宠。——大臣和他的属下的品格。——宫廷上的两面三刀。——贪污和腐败。——这种本质的普遍性。

如果我们想到君主政体带来的另一个恶果，宫廷的存在和它的腐败，我们就会对于君主国家中用来沟通情况和贯彻措施的那种安排做出更恰当的判断。

同所有其他的人类制度一样，这种制度的性质也是从它的周围环境中产生的。大臣和宠幸有一个高贵的囚犯在他们的监管之下，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支配他的全部认识和行动。这一点，他们在一个软弱而轻信的君主身上能够完全实现，就是一个最机警明察的君主也不能完全逃脱他们的诡计。不论是为了官俸，或者是为了尽忠，或者由于任何更美好的动机而从政，他们都必然希望继续从政。当然，他们越是获得君王的信任，他们的地位也就越巩固；他们越获得君王的偏听偏信，君王也就越是盲目地信赖他们。绝顶聪明的人也可能犯错误；最美好的计划也会遭到似乎有理而肤浅的反对；所以不能不常常发生这种情形：一个大臣为他自身的安稳而尽量“去排挤”反对他的进言人，这些人也许正是由于要取代他的地位，其进言就更为尖锐和机敏。

大臣们在他们各自的范围内也变成了小型国王。虽然他们有极充分的机会看到这种角色的软弱无能和毫无意义，但他们还是羡慕它。他们的职业就是不停地赞美他们所服侍的主人的尊严和伟大；人们在长期积极努力使别人相信一种说法的正确时，自己就不能不被这个说法弄得半疑半信。他们感觉到，自己热烈希望得到的一切，都是靠着这个人的专断意志所决定的；而自卑感大概永远是仿效和羡慕的根源。因此，他们就自愿和这个同自己处境颇为相似的人同化了。

事实上，君主政体所赖以存在下去的条件，光靠有大臣参预还是不完备的。大臣还必须有大臣，以及一大串从属关系，构成了冗长而复杂的等级差别。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都要看大臣的笑脸生存，正象大臣要看国王的笑脸生存一样。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要营求的微末利益；都有假托服从而实际由他统治的王国。每一个人都模仿上司的恶行，并且强迫别人必须象他不得不谄媚奉承一样来对他谄媚奉承。

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国王必然而且几乎不可避免地在本质上都是一个暴君。他已经习惯于听到那些为了使他高兴的事情；他听到性质不同的意见，就产生一种刺耳和不舒服的感觉。他已经习惯于人们的立即服从；要他能够倾听逆耳忠言是很困难的。因此，那种诚实和有德的、具有明确和坚定原则的人，是最没有资格为他供职的；他或者必须放弃自己的严肃原则，或者是让位给一个更狡猾和更会逢迎的政客。善于逢迎的政客要求别人象他自己所表现的那种顺从；而他最不肯饶恕的过失就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和不受欢迎的多虑。

他要求他的阴谋的所有助手和工具都有这样的顺从，不久他就开始把这种顺从当作衡量别人功过的标准。除去符合统治的机密的或者能促进他的私人利益和扩大他的势力范围的建议以外，他都充耳不闻。最坏的人只要抱着这种对他有利的见解，看来就是值得鼓励的；最好的人，如果只有美德，就

只会遭到傲慢和轻蔑的待遇。衡量人类善恶的真实标准，固然很难废除和颠倒。但是表面看起来是被颠倒了，而表面现象是会产生许多实际效果的。为了得到荣誉，人们会认为，对统治者必须表示一种卑屈的奉承，以隐忍的耐心去承受他们的侮辱和轻蔑，阿谀他们的罪恶，并帮助他们满足私人欲望。为了得到荣誉人们会认为，必须以不倦的努力和阴谋诡计，去结成朋党，取得达官贵人的推荐，以及供人玩弄的女人和小职员称赞。为了得到荣誉，人们会认为，必须甘受侮辱。整个场面上充满了空虚、两面三刀和口是心非。大臣替他看不起的人说好话；而那个奴才又对宰相装出一副万分依恋不舍的神情，可是心里想的却只有个人的私利。在最坏的政权下，这些本质中也许会偶然搀杂有几件较好的事情，否认这一点是愚蠢的；在任何有宫廷和国王的国家里，如果认为这些本质不会汇成主流，那就是疯狂的了。

有一种最突出的特点，即使最肤浅的宫廷生活描写家也从来没有漏掉过；我指的是在宫廷环境中滋长起来的极端虚伪。首先，宰相必须欺骗国王，经常假装跟他的主子有同样的感受，用一贯的不真诚来讨好，装出一副满怀忠心的样子。其次，他必须欺骗部下和谋求职位的人；让这些人永远处在热烈希望和期待之中。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大臣朝见时的情景。从表面上看来，我们可能认为，这是最能流露真挚感情的地方。事实上人类一切正直和坚毅的品质都被可耻地抛弃掉。没有一种恭顺的表白能够如此卑贱；没有一种献媚的形式会象这样荒唐，但是这一切都被那些自愿卖身投靠的人热心地实行着。可是，尽人皆知的是，正是在这种场面下，仇恨凝固在心头，嫉妒蕴聚于胸中，大多数人，全部以有机会互相陷害为快事。正是在这里充满了荒唐的诺言、表白和誓词，以至于失掉了它们的本义。几乎没有一个人会这样愚蠢，他在得到宫廷中的许诺时，能够不担心这种诺言会象对千许多别人那样是骗人和不可靠的。

由于长期的虚伪的实践，最后，真正的献媚者竟不能在自己的感情中，分清哪些是虚伪的，哪些是真实的。他的伎俩达到这种炉火纯青的地步，以至他既没有了激情，也没有了依恋。私人的友情以及对别人优点的一切考虑，都被狭隘和卑鄙的野心所吞没；这并不是那种使罪恶也能反射出光辉的维护人类尊严的豪迈的抱负，而是一种满足私欲和阴谋权术的野心。这种人早已不受一切道德的约束，并且认为靠牺牲尊严、真诚和正义，可以最廉价地促进自己的目的。他孜孜以求和最引为自豪的就是不露真相；使什么人也不能够发现他的图谋；即使你同他交谈一辈子，他也要永久不让你看穿他的秘密。他的伎俩已臻纯熟，因而他会常常在没有理由、没有必要时也去使用它。历史就是这样记载着那些豪迈仁慈和亲爱的例子，君主也就是这样来对待他们已经决心要毁灭掉的人的。人们似乎因为表现了高度的堕落和虚伪，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鸣得意。具有这样性格的大臣是具有美德的人的死敌。这样的廷臣结成的私党是极端可怕的。他们进行暗害；事前不加警告，事后不留痕迹。如果他们不得不同一个直率的、公正的、不懂得虚伪的人或者一个光明磊落轻视玩弄欺骗手段的人打交道，他们就决定这个人是他们一定要陷害的对象。没有一个善良和公正的人能够逃出他们的魔掌；宫廷的不道德使一切罪恶为之失色，这股邪风吹遍全国，即使在人口最多的国家里，公众的情绪也会变得无力。

君主政体的一个根本缺点，就是它把那些本质上最重要的事情，通过层层等级，交由一些个人去任意处理。一个选民团的表决，总会或多或少地

代表舆论。一个个人的选择就会取决于任性、私人方便或者金钱的贿赂。即使国王是坚持正义的、大臣是廉洁的，但是根本弊端依然存在，本身不免也有错误的国王和大臣，在无数情况下必须依靠别人的建议。而谁来对此负责呢？是国家官吏和代理人员，是微贱的朋友和好管闲事的仆从、妻妾子女和忏悔牧师？

许多人认为，在象人类这种不完美的生物当中，世袭罔替的爵位对于维持秩序是必要的。但是大家都知道，世袭罔替的爵位是一种人为策略，而不是永恒真理的法则。任何地方有它存在，人类思想，拿同政治社会有关者来说，就不能落实在它的真正基础之上。基于真正的认识，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欺骗！但是政权却急切地叫我们崇拜并服从。这两者之间经常存在着斗争。在这种力量不均的斗争中，恐惧和忧虑会不断侵袭那些拥有篡夺来的权力的人们的思想。在人类这种不自然的状况下，必须用有力的手段防止人们上升到人的真正地位。统治者的要务就是要使被统治者相信，作奴才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他们只能从公众的被歪曲了的认识和成为他们的负担的财产上边来造出这种虚构的利益，而这种利益则要公众用官衔、勋章和贿赂来作为回报。因此才产生那种普遍腐败的制度，没有它，君主政体是不能存在的。

有人认为，混合形式的政府特别容易腐化。“在这样的政府中，人民有一部分自由；权利和特权同样有它们的地位；这类国家里的人民有一种倔强的态度和独立的意识。乡绅们不经过慎重考虑，决不肯放弃自己判断的决定。这里不止有一条发迹的道路；群众的爱戴和官廷的奖励同样是进取的可靠手段。在专制国家，人民可能被象绵羊一样地被驱使着；他们的处境诚然不幸，但他们不知道有其他道路，所以他们就拿它当作一种不可避免的灾难去忍受。他们的性格特点是一种麻木不仁的迟钝，在这种状态下，人类的一切活力都被闲置起来。但是在一个自称为自由的国家里，人民的思想是处在一种动荡不安的状态中，必须采用非常的手段才能稳定他们的激昂的情绪。”衷心热爱美德的人，认为为了金钱而卖身投靠是最可鄙夷的道德败坏，因此当他们考虑到上述情景以后，有时就以为一种公认的专制政体，要比具有说起来好听却并不完全的自由的国家要好一些。

但是上述情景并不准确。关于混合形式的政府的一些情况，应该承认是真实的。但对于专制政体的特点，却谈得过分于它有利了。不论特权是否是根据宪法的各种程式授与的，但是不可能使整个民族毫不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人民还从来没有愚昧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想象：一个人，因为有了国王的称号，就真能顶得上一百万人。在整个民族中，君主政体的国家至少是应该包括有整个民族的，既有贵族也有自由民，既有富人也有穷人。还会有这样的人，他们凭借地位、财富和才能，在国王和平民之间形成一个中间阶层，并且能够通过结盟和计谋使国王感到畏惧。这些人不加以收买就必须加以排斥。不断的恐怖同惊扰乃是同专制政体结合得最紧密的一种性质。在法兰西的旧政权之下，所以产生大批的密探和那样多的国家监狱，难道是为了什么别的缘故么？暴君永远也不能合眼，这些恐怖要求有多少种防范和戒备的措施啊！只有在监视之下，人们才能出入这个国家。没有政府的出版许可，出版界什么也不准出版。所有的咖啡馆和公众场所，都是监视的对象。除非是举行宗教仪式禁止二十人以上的集会，因为他们立刻会被猜疑是在讨论他们的权利问题。在采用防范手段的情形下，难道能够说就没有贿赂现象吗？即使如此，情形也不会好多少。最使人厌恶的景象和最使人失望的人类处境

莫过于整个的民族被纯粹的恐吓手段所压服，其中最优秀的应该作为表率的人受到最严厉惩罚的威胁而不能表达真正的见解，因而也就根本不能形成任何值得表达的舆论。但是，实际上，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恐吓从来都不是被采用的唯一手段。任何暴君从来也不是那样地孤单，以至于在他的罪恶中竟会没有同党。我们总会看到这个庞大的机构，是由败坏人类品德的严刑峻法、威迫利诱、封官许愿、讨好收买等各式各样的手段支撑着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一点，君主政体才是一个开支庞大的机构。专制君主的主要务就是把他那有魔力的轮盘赌彩，尽量分成更多的彩头。在金钱政治的后果当中，最突出的要算是：一切的人都有其身价，并且由于收买是在暗地里进行的，所以许多看来好象是爱国的人士，其实是被雇用的走狗；美德也被这种手段弄得失去光彩，不是被人看作纯粹胡说，就是被人怀疑为罪恶的遮羞布，而罪恶越是遮遮掩掩，其实也就越会丢丑。